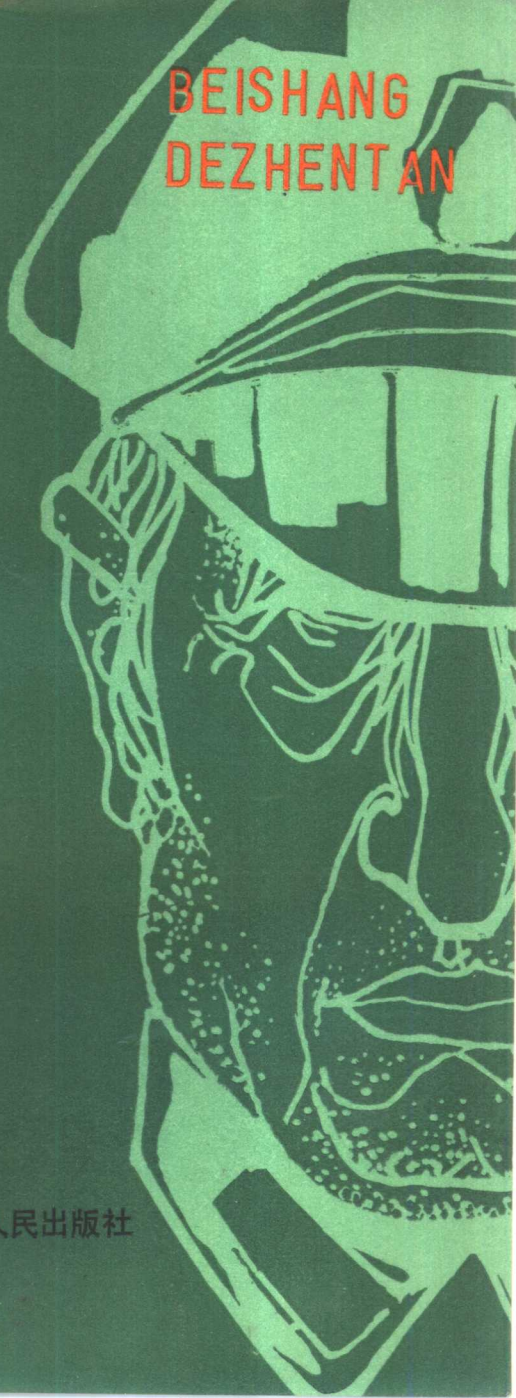


BEISHANG
DEZHENTAN

悲伤的侦探

〔苏〕维·阿斯塔菲耶夫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悲伤的侦探

「苏」维·阿斯塔菲耶夫 著
余 一 中 译

В.П.АСТАФЬЕВ
ПЕЧАЛЬНЫЙ ДЕТЕКТИВ
《ОКТАБРЬ》№1 • 1986

悲 伤 的 侦 探
Bei shang De Zhentan

〔苏〕维·阿斯塔非耶夫 著

余一中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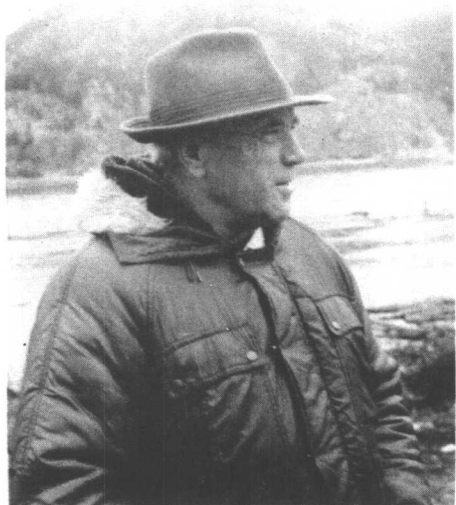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6 2/16插页3 字数120,000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511

ISBN 7-207-00857-0/I · 168 定价：2.15元



维·阿斯塔菲耶夫

这本书的一切都很奇怪

(作者序)

这本书从构思、写作、发表《长篇小说《悲伤的侦探》从交稿到在《十月》杂志上刊出，只用了三个星期，这在苏联出版界是前所未闻的高速度！）到评论界和读者，包括国外的评论界和读者的强烈反应，都可以说是很奇怪的。

在我的将近四十年的文学实践中，构思，更准确地说，是产生构思的推动力，有两次是来自文学作品的，而且相当奇怪的是，两次都来自法国文学，虽然我并不敢贸然自命为法国文学的内行。

那还是1954年的事。当时我住在乌拉尔，当一名外勤记者。有一次，我到煤矿区出差，躺在车厢里，纯属偶然地睡过了我应当下车的车站。惊慌中，我在一个偏僻的会让站下了车。我要在这里待到晚上，等着我刚才坐的那趟车返回来。当时，我的衣袋里有一包香烟和一本普雷沃神甫^①写的书《曼依·莱斯戈》。在这以前，我还没有读过这本书。那是风和日丽的九月的一天。这种天气在乌拉尔格外奇妙，温柔，美好。我登上一座山岗，躺在草地上，一口气读完了关于轻

① 安·弗·普雷沃(1697—1763)，法国作家。

桃的曼依姑娘和高尚的德·格里欧骑士的优美的故事。

当时，同德国的那场可怕的战争结束还不到十年，我在那场战争中是普通一兵。我们饱受痛苦的人民还过着艰苦的生活，还在恢复被战争毁坏了的经济。人们的创伤还在发痛，心里还在为失去的青春年华和牺牲的友人而悲伤。人们对战火纷飞的情景还记忆犹新。热血的气味还没有散尽。当时的生活是很紧张的。生存斗争和人的关系常常是很原始，很野蛮的。战争摧毁了我们许多人心中的温柔、关切、感伤等概念。

读着这个动人的、单纯而永恒的爱情故事，我不由地惋惜我们失去了爱情和过去几百年间的男人和女人所具有的那些感情。难道我们的爱和痛苦的愿望就永远毁灭了？难道我们的世界就再不会同情，不会温柔，不会忘我地为善服务，而善正是生长爱和兄弟情谊的土壤。还有，难道我们男人就再不能为爱去死吗？就再不能为女人去死吗？

我用了将近十五年的时间，才回答了这些乍看起来显得很简单，但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的问题。

到了六十年代，我才决定实现这一使我长期不得安宁的构思。于是，我写了《牧童和牧女》这本书，书的副标题是“现代田园诗”。

又过了十年，我得到了基耶拉戈的名著《葡萄牙书简》并读完了这本书。这本书象《曼依·莱斯戈》一样把我迷住了。在后来的许多年中，我又无数次地重读过这些书简，这是一位女僧侣的信，她是一个奋不顾身地、“彻底地”、忘我地恋爱的女人。我的心又因被我们永远丢弃的东西而感到难

过和疼痛。我又想要使类似未能实现的爱情的事物在纸上复活。《牧童和牧女》一书在我还没有写完它的时候，我就能背述出它的内容。而带有《悲伤的侦探和孤独的女僧侣》这一奇怪名称的奇怪的书，我在开始时几乎是“盲目地”、“摸索着”拼凑的，所以自然什么也没有写出来。

我把那部已经相当厚的手稿放到一旁，有一段时间我干脆把它给忘掉了。

有一次，我在编选一部短篇小说集的时候，忽然觉得，我可以从闲置的那部手稿中整理出一篇短篇小说。然而短篇小说并“没有弄出来”。但是，手稿却把我给吸引住了。于是，我就试着从手稿中“弄出”一部小中篇，但是，中篇小说也没有写成功。我感到，我的这部作品象是长篇小说。不过，我很长时间也不敢说出“长篇小说”这个内容丰富而责任重大的词，一直想用各种文学的巧计和程式“蒙混”过去。我用过“偶然的罗曼史”、“小罗曼史”，甚至还用过“奇怪的罗曼史”等名称。但是，这些办法帮不了我的一点忙。当我终于决定采用“长篇小说”这个词并开始按“长篇小说”的形式写作后，事情就有了进展。在《悲伤的侦探》中，旧稿子只有四分之一的篇幅保留了下来，同时又不幸地出现了许多，或者说过多的人物，其中有一些是几乎无法把握的人物。而“孤独的女僧侣”那条线则只留下了我所忠实喜爱的基耶拉戈的那本书中的几小段。

我国的批评家和读者执拗地不想承认《悲伤的侦探》是一部长篇小说。真奇怪！当我写《鱼王》（它已经被译成中文了）时，我把它体裁定作短篇叙事集，而批评家们无视我的

意见，至今仍称之为长篇小说。我国出版的好几套长篇小说丛书都把它收了进去。但是，当我觉得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的时候，他们却不承认它是长篇小说了。诚然，这是一部较短的长篇小说，因为我认为，现代人没有时间读大厚本的书，现代作家必须应当重视一切时间，包括重视人的时间，应当考虑到读者是有修养、有文化的人，从而浓缩材料，写得集中扼要，但是又不损害艺术性，不损害内容和可读性。我想，现代作家除了其他的一切以外，还应当探寻新的文学形式，探寻内容最丰富的，同时也可能是全新的用词语在纸上描写生活的方法。总而言之，作家应当在现代条件与生活要求的水平的高度上进行工作，同时又不要忘记传统。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世纪的任何一位艺术家，也没有在我们生活与工作的如此不幸的环境中，如此不幸的时代里生活与工作过，我们站在深渊的边缘，清晰实际地，而不是书卷式的体会到哈姆雷特所说的“是存，还是亡？”。

我想，我大概还是在某种很有限的程度上对现代生活做了一些思考，借助一些适合现代的手法（比如说，材料的浓缩这一点吧）触及到了我们生活的要害。我之所以说“我们的”，是因为世界灭亡的可能性使我们——俄罗斯人、西班牙人、法国人、美国人——和我们地球上的一切人民在共同的灾难面前同样地无法防御。

大概正因为如此，长篇小说（我还要强调是长篇小说！）《悲伤的侦探》正在被译成多种文字。即使那些从未翻译过我的书的国家也在翻译。也许，这就是我国对这本书表现出强烈注意的原因。

我已经不去管这部长篇小说了。另外一些构思和事情把它从我身边挤开了。现在,《悲伤的侦探》在过它“自己的”、独立的生活,就象我的子女们那样。他们有自己的忧虑、事务、兴趣、爱好、快乐和悲伤。

莫斯科的“莫斯科市苏维埃”剧院根据我的奇怪的长篇小说,推出了一出奇怪的戏。有人在准备把小说搬上银幕。我想,或者说,我差不多相信,拍出的将是一部奇怪的电影……

看来,世界上还在发生种种奇怪的事!也正因为我们这个不安宁的、令人担忧的奇怪的世界才很有吸引力。

维·阿斯塔菲耶夫

1987年12月7日

第

一

章

列昂尼德·索什宁情绪极坏地往家里走着。尽管到铁路住宅区要走很远的路，几乎快要到市郊了，他还是没有去坐公共汽车。随那条伤腿痛去吧，走路会让他安静下来的，他可以在路上好好地回味回味在出版社里听到的那些话，同时认真考虑考虑，往后他应该怎样生活，怎么办。

其实，维伊斯克并没有什么象样的出版社，出版社已经搬到一座较大一些的城市里去了。在取消派们看来，那城市大概要比维伊斯克文明一些，而且还拥有雄厚的印刷力量。维伊斯克只剩下了出版社的一个分社。那座大城市的“印刷力量”也象维伊斯克的一样，只不过是古老的俄罗斯城市留下的烂摊子。印刷厂坐落在一幢革命前盖起的坚固的黄砖房里。房子的墙上布满了一个个狭长的窗户。窗户的下半部有栅栏，上半部呈弧形，很漂亮，整个窗户看上去象是一个个狭长而挺拔的感叹号。而维伊斯克印刷厂的建筑有一半早就沉到地下了，这一半里有排版车间和印刷机械。所以尽管排版车间和印刷车间的天花板上点着几排密集的日光灯，但是里面还是很不舒服，阴森森的，而且不知为什么，总使人感到有一种堵着耳朵时听到的吱吱声，或埋在地里的定时炸弹

的定时装置发出的声音。

出版社的分社设在两间半房间里，这还是州报社好不容易让出来的呢。在其中的一间房间里，弥漫着香烟的烟雾，当地的文化明星瑟奥克佳布林娜·佩尔菲利耶芙娜·罗克瓦索娃，双手抱着电话，抖动着身子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弄得到处都是烟灰。她就是这样推动当地文学事业的进步和发展的。瑟罗克瓦索娃自认为是最聪明的人，虽然在全国文化界还数不上数，但是在维伊斯克，实在没有人可以在智力上同她相匹敌了。她经常给人们做报告，讲当代文学的情况，在报纸上介绍出版社的计划，有时还在一些报纸上评介当地作家的书，动不动就引上几段名人语录。这些语录有维吉尔^①的和但丁的，有萨伏那洛拉^②的、斯宾诺莎^③的、拉伯雷^④的、黑格尔的和圣埃克苏佩里^⑤的，有康德的和爱伦堡^⑥的，有尤里·奥列沙^⑦的、特列古勃^⑧的和叶尔米洛夫^⑨的。此外，她也会骚扰一下爱因斯坦和卢那察尔斯基^⑩的亡灵。对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们，她也不会不予注意的。

关于索什宁的书的事，本来早就定下来了。书中的一些短篇小说已经在杂志上发表过，尽管那只是一些薄薄的杂

① 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罗马诗人。

② 萨伏那洛拉（1452—1498），意大利基督教宣传士、改革家和殉教士。

③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

④ 拉伯雷（1494—1553），法国人文主义作家。

⑤ 圣埃克苏佩里（1900—1944），法国飞行员、作家。

⑥ 伊·爱伦堡（1891—1967），苏联作家。

⑦ 尤·奥列沙（1899—1960），苏联作家。

⑧ 特列古勃（生卒年不详），苏联文学评论家，六十年代亡故。

⑨ 弗·叶尔米洛夫（1904—1965），苏联文学理论家、批评家。

⑩ 阿·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苏联政治家、作家、文艺评论家。

志，可总还是首都的杂志呀。在综述性的评论文章中，还三次提到了这些短篇小说，评价还不错。他等待了五年，才排上了号，被纳入了出版计划。剩下的只是书的编辑和装帧业务了。

瑟罗克瓦索娃约他十点整来商谈有关书的事情，可她自己快十二点时才在出版社分社里露面。她喘息着，喷出的哈气直冲索什宁的脸，急匆匆地从索什宁的身旁跑过，嘶哑地、漫不经心地说了声：“对不起！”走廊里光线很暗，因为灯泡不知被什么人“拿”走了。瑟罗克瓦索娃用钥匙在那把蹩脚的门锁上捅了半天，嘴里小声地骂了起来。

门终于生气地响了一下，打开了。那扇关得不太严的旧门板把一道灰色的沮丧的光线放进了走廊。外面已经淅淅沥沥下了一个多星期小雨了。这雨把雪冲成了一锅粥，把大街小巷变成了盛水的盆盆罐罐。河面上的冰也开化了。十二月份竟会有这样的天气！

伤腿不断地感到隐钝的酸痛。不久前受过伤的肩膀也火辣辣的疼得钻心。他疲倦极了，真想睡上一觉。前天夜里，他又失眠了，不得不又一次用笔和纸来排解失眠的烦恼。“我得的是不治之症——写作狂，”索什宁苦笑了一下，好象打起盹来。这时，咚咚的敲墙声突然打破了寂静。

“加利娅！”瑟罗克瓦索娃傲慢地对着空间喊道：“叫那位天才到我这儿来！”

加利娅又是打字员，又是会计，同时还兼任秘书。索什宁朝四下里看了看，走廊里再没有别的什么人了。看样子，天才就是他啰。

“喂！你在哪儿呀？”加利娅用脚把门推开一道缝，又把剪得短短的头伸到走廊里喊道：“进来。叫你呢。”

索什宁活动了一下肩膀，整理了整理脖子上系的新的真丝领带，用手掌把头发朝一侧抚平。他在激动的时候总是爱抚摩头发。小时候，邻居的阿姨们和丽娜姨妈经常抚摩他的头，结果他就养成了抚摩头发的习惯。“冷静点儿！冷静点儿！”索什宁命令自己，然后很有涵养地咳嗽了一声，问道：“可以进来吗？”他那老练的刑警的目光一下子就看到了瑟罗克瓦索娃办公室里的一切：屋角里放着一个古老的旋制的书架；一件全城人都熟悉的潮湿的棕红色皮袄卷曲地挂在车制的木衣架上。皮袄上没有挂衣环。皮袄后面是一个用刨光的木板做成的没涂油漆的书架。书架上摆满了联合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在书架上的显眼处，漂漂亮亮地摆着几本装帧相当不错的广告礼品书，都是人造革的封面。

“请把雨衣脱掉，”瑟罗克瓦索娃朝一个刨木板做的黄色旧衣橱扬了扬头说。“里面没有衣钩，钉了几个钉子。”她说着指了指她对面的一张椅子。在索什宁脱去雨衣之后，瑟罗克瓦索娃激动地把一纸包东西往她自己面前一扔。这个纸包她好象是从衣襟下拿出来的。

索什宁好不容易才认出来，这就是他的那包手稿，因为自从他把手稿交给出版社后，这稿件走过了一段复杂的创作道路。他又是凭着刑警的目光发现，在这包手稿上放过茶壶，小猫也在上面待过，有人还曾把茶洒在这上面。瑟罗克瓦索娃的神童们（她和不同的创作者生了三个儿子）在纸包上画了和平鸽、带星星的坦克和飞机。他还记得，当初他特意

挑了这样一个五颜六色的纸袋，小心翼翼地用它来装自己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他还在纸包中央贴了一块白纸，用吸水笔工整地写下了这样一个并不很出奇的标题：《最宝贵的是生命》。当时，他有充分的理由说这句话，他把这个纸包送到出版社来时，怀着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更新的心情。他渴望着生活、创造，渴望着做一个有益于人们的人。所有“从阎王的门槛里”爬出来、又活下来的人常常有这种感觉。

在这五年中，贴上去的白纸条已经变成灰色的了。看来，有人用指甲抠过它。也可能是因为浆糊不好吧。而那快乐的情绪和明朗的心情又都跑到那儿去了呢？他看见桌子上，在那保管得极不经心的稿件旁边，还有两份书评，这是在瑟罗克瓦索娃那儿挣外快的乖巧的当地酗酒思想家们草草写成的。他们都和民警打过交道。他在创作中，也就是在这包手稿中就反映了民警的工作，大多是他们在医疗醒酒站的工作。索什宁知道，人们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会使一个人的生命和一个社会付出多么重大的代价。不管怎么说，他领悟了这一点，而且体会很深，终生难忘。

“唔，噢，最宝贵的是生命，”瑟罗克瓦索娃撇着嘴唇，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沉浸在吐出的烟雾中。她迅速地翻弄着书评，一个劲儿地沉思地、旁若无人地重复说：

“最宝贵……最宝贵……”

“五年前我是这样想的。”

“您说什么？”瑟罗克瓦索娃抬起头说。索什宁看到了她的皮肉松弛的双颊、漫不经心涂过的青眼皮、用干涩的眉笔草草画过的睫毛和眼眉。在她那毫无生气的开始脱落的睫毛

和眼眉中，残留着一些细小的黑团。瑟罗克瓦索娃的装束倒是很随便，这是一套时兴的女装：黑色的套头衫（不用经常洗），外面罩着一件牛仔服（用不着熨烫）。

“五年前我是这样想的，瑟罗克瓦索娃同志。”

“难道您现在不这样想吗？”瑟罗克瓦索娃一边象翻弄烂白菜帮子一样翻弄着手稿，一边说。她的语气和表情中都显露出尖刻的意味。“对生活失望了吗？”

“还没有完全失望。”

“原来是这样！太有意思了！太棒了！您是说，还没有完全失望？……”

“她肯定忘记了稿件的内容！她想要争取一点时间，以便匆匆忙忙地再翻上一遍。她会怎样对付我呢，这可真有意思。非常有意思！”索什宁并没有回答女编辑的似问非问的话，而是等着她说下去。

“我想，咱们别长篇大论了。本来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稿子已纳入计划了。我这就做点加工，把大作弄得象模象样，然后就交给美工。我看，夏天您就会拿到你的第一本印刷好的作品。当然，前提是要给纸张，印刷厂别拖期，也别削减出版计划，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情况。下面我想同您谈谈将来的事。从报刊上看，您在继续顽强地工作。您在发表作品，虽然并不经常，但令人震惊，而且您写的也都是迫切的题材——有关民警的题材！”

“有关人的题材，瑟罗克瓦索娃同志。”

“您说什么？您有权这样认为。但是开诚布公地说吧，您要写人的问题，那可还差得远着呢，更别说全人类的问题

了！正如歌德所说的那样：‘乌涅拉依赫巴尔—维—德尔—希梅尔。’象天空高不可攀。”

索什宁不知为什么没有读过这位德国大诗人的这类话。看来，瑟罗克瓦索娃在生活的忙乱中，把歌德和别的什么人搞混淆了，或者是引得不准确。

“您还没搞通，什么是情节安排，可是不懂得情节安排，对不起，您的那些民警故事只是些糟糠，碾米时剩下的糟糠。”瑟罗克瓦索娃大谈起文学理论来。“还有散文的节奏，这可是散文的精髓，这可是相当重要的。还有形式，永远层出不穷的变化形式……”

“什么是形势（式），这我知道。”

“您说什么？”瑟罗克瓦索娃如梦初醒地说。她在起劲地说教的时候闭上了双眼。烟灰落在了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压着几张她的那些神童作的画，一张外地来这儿的诗人的揉皱了的照片。三年前，这位诗人喝醉了酒，在旅店里自缢身亡。就由于这一原因，他才进入了时髦的、甚至神圣的故去者之列。她的外衣上也落上了烟灰。而瑟罗克瓦索娃的全身都好象蒙着一层时间的灰烬和锈痕。看上去，她就象一台蹩脚的电视机里放出的人像，这台电视机的显象管老化了，有两只电子管也不亮了。

“我说，我知道形势（式）。我们经常分析形势（式）。 ”

“我不是说你们的公安形势。”

“对不起。我不懂您的那些奥妙。”索什宁站起身来。他觉得，他的怒火开始往上冒了。“如果您再没有别的事

情的话，我就要告辞了。”

“好的，好的，请便吧，”瑟罗克瓦索娃稍微有点儿窘地说。接着，她又换了一种公事公办的语气说：“会计室会给您预支稿费的。一次付百分之六十。不过说到钱，我们这儿的情况一向不妙。”

“谢谢。我有退休金。够我用的了。”

“退休金？你才四十岁呀！”

“我四十二岁了，瑟罗克瓦索娃同志。”

“对男人来说，这点儿年纪又算得了什么？”象一切永远不安分的雌性动物一样，瑟罗克瓦索娃活跃起来了。她摇头摆尾地把尖刻的腔调换成了半开玩笑的信任的腔调。

但是索什宁并没有理会她的腔调的改变。他点头告辞，又走到半明半暗的走廊里。

“我把着门，让它开一会儿，免得您摔死！”瑟罗克瓦索娃在他身后喊道。

索什宁没有理她，径直来到大门口的台阶上，在雨搭下站了一会儿。雨搭的边上装点着一些古老木雕的花边。这些木雕花边已变得枯燥而丑陋了，就象是黑麦烤的糕饼。索什宁竖起防寒的民警雨衣的领子，把头往肩膀里一缩，迈步跨到无声的细雨之中，好象走进了一片下陷的荒漠。他来到附近的一家酒吧里，在场的老主顾们用赞许的喊叫声欢迎他，试着想同他“座谈”一番。他要了一杯白兰地，一饮而尽，然后就离开了。他觉得嘴里发木，心口发热。肩部火辣辣的疼痛也被暖意消除了，而对腿上的伤痛，他似乎习惯了，或者说，他已经习以为常了。